

网络集群的自组织特征

——以“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为个案

曹 阳,樊弋滋,彭 兰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在网络中的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在这些网络讨论的集群内部,参与者会自发形成一定的秩序,推动事件的进行。本研究利用自组织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选取“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集群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网络集群参与者之间从无序到有序的互动过程、整个系统的演变规律及其与外界的互动机制,由此总结出网络集群中的自组织特征,从而相对准确地把握虚拟社区系统的发展、演化阶段,为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的社会功能起到借鉴作用,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群体事件的预防工作提供理论和策略上的支持。

关键词:网络集群;自组织;微博;南京梧桐树事件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1)03-0001-10

一、导言

近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增多^[1],集体事件呈高发态势。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鲜明有力,诸如“厦门PX事件”、“躲猫猫事件”等影响较大的网络集群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网民中的强大舆论力量。网民通过某一话题的关注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以平等的姿态理性发表看法,期望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绝不是一团散沙的无序状态,而是一种能够“有机团结”的系统^[2],用户的行为不是纯粹的非理性的宣泄,其内部存在着一种自动自发、自主自为的、理性的自组织特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网络公共事件的分

析,大多借用传统集群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注重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但随着此类案例的逐年增多,我们发现网民在话题的讨论中呈现出来的规律性的行为越来越多,网络社区不应再被看成简单的“数字超市”,而须以系统论的眼光考察其中诸多要素的互动和交换过程,重点考察网络集群参与者之间从无序到有序的互动过程及其整个系统的演变规律,由此总结出网络集群中的自组织特征,从而相对准确地把握虚拟社区系统的发展、演化阶段,为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的社会功能起到借鉴作用,也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群体事件的预防工作提供理论和策略上的支持。

二、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1. 作为系统的网络社会

由于互联网在社会信息交流方式上所带来

收稿日期:2011-05-27

作者简介:曹 阳(1987-),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

樊弋滋(1988-),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

彭 兰(1966-),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新媒体、媒介融合。

的变革,以及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沟通平台,许多学者将互联网看成一个巨大的系统。“系统”是一种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元素构成的并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具有不同于元素的新质的整体状态和演化过程^[3]。互联网本身符合系统的特性,它可以看成是高开放性、全球化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计算机能共存于同一网络,不同网络通过网络协议相互传递信息,分布式网络的构建使得世界变成一个信息交流系统的整体,“地球村”的状态也在变成现实^[4]。学者还将网络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在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很高的相似性,并提出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网络社会现象^[5]。从进化系统角度出发,互联网本质上又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是整个社会更大的、更中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技术社会(technosocial)的自组织系统^[6]。

2. 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系统进化的原因以及系统结构的形成过程^{[7][17]}。它是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等多学科在内的复杂学科群。自组织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系统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的一般条件、机制和规律性。孙志海将自组织系统层次跃迁和进化概括成非组织向组织的有序化发展过程(创生)、组织的复杂性相对增长的过程(自扩张)、组织维持系统现状的过程(自维持)、系统走向解体退回到较低的层次状态过程(自退化)这样四个过程^{[7][23]}。

随着社会化媒体(以SNS、微博为代表)的迅速扩散和使用,自组织理论也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和发展空间。不少学者已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网络虚拟空间,金兼斌认为网络舆论平台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净化机制或“准生命体功能”^[8]。彭兰认为自组织是影响公民新闻的一种重要的机制^[9]。武艳君、刘丽晶认为虚拟社区与耗散结构的典型例证贝纳德花纹相类似,构建出的是一个“活”的有序结构,具备开放性、远离平衡、非线性作用机制、涨落等形成耗散结构的一般条件^[2]。孙佳音、高献忠更为关注虚拟社

区中秩序和规则的构建模式^[10]。

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内外传播学界对将自组织嫁接到新媒体技术领域有着较多的关注和思考,但有这样一些制约因素还存在:第一,虽然国内对于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开始增多,但迄今为止有关新媒体与自组织的专论为数不多,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诸如社区建设、企业管理、教育教学等现实领域中;第二,大部分研究限于宽泛的应然式探讨,触及的仅是虚拟社会所具有的自组织特征,将网络社区与自组织系统进行对照和类比,属于静态的研究,而少有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出发,从具体的网络形态入手进行的动态分析;第三,目前作为自组织研究对象的以QQ群、专业网站、BBS为主,将这些网络应用本身看作一个系统,研究其创生、发展、衰退的过程,但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在某种网络应用内部所产生的自组织现象,这种微观层次的自组织规律更能揭示出网络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如何进行组合、分化、信息交换。

因此,我们希望从微观层次入手,将研究对象由完整的网络应用具体到其内部的集群中去,以自组织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网络集群自组织的过程和特征。

3. 网络集群行为

在网络社会中,“一定数量的、无组织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意见的强化与汇聚为特征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民聚集”^[11]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集群”,它和现实中的集群行为的相通之处在于也具有自发性、无组织性和不可预期性^[12]。

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架构中,大多数集群行为的研究者都倾心于解答一个问题:个体的行为如何转化成集体行为的?网络集群研究者已尝试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网络集群的产生原因:Spears和Postmes等学者将“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拓展到了互联网应用中,他们发现,当个体有高社会认同或者低个人认同时,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将增强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遵守^[13]。魏娟、杜骏飞以S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网络集群行为是“结构性助长”、“结构性压力”、“普遍的信念”、“催化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14]。彭兰借用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等人在最近几年提出的“议程融合”的理论来解释个体加

人议题如何获得归属感^[9]。此外,在集群行为动力的解释上,比较重要的还有奥尔森为了克服群体中的“搭便车”现象而设计的“选择性激励”机制^[15],以及于建嵘在对农民维权抗争行为研究后总结出的“压迫性反应”机制^[16]。这两种理论虽尚未被纳入网络集群的动力机制解释范畴内,但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对于集群行为的分析都存在着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辨^[17]。孙凤、郑欣选取个案,分析网络集群事件的发展阶段,认为在爆发期是非理性情绪化表达;交作期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点的互相博弈;平息期是理性观点逐渐强大并以积极的方式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18]。

由此可见,学者已经通过具体的案例发现,网络集群的发展实质是一个由非理性逐渐趋向理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秩序。有研究者就试图以复杂系统思想为指导,以基于对象的建模方法作为整合微观个人行动、个体间交互作用以及宏观整体模式的工具,探讨群际冲突等心理学、社会学问题中的基本机制^[19]。国内学者中如丁未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社群为个案,采用质化研究法详尽分析了该网络群体渐进式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民间网络的自组织行为特点及其对公民社会构建中的作用^[20]。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在自组织理论的框架下,选择微博中的典型网络集群事件,判断其是否符合复杂系统的各种条件并作完整描述;考察集群创生的动力机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内部成员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与现实的互动;根据微博传播的特点来探寻网络集群自发秩序的形成途径和维持办法;结合国情探究普通公民借助互联网与权力阶层对话的策略和效果,分析技术的力量能否可能冲破制度障碍,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个案分析

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截至2010年10月底,新浪微博用户数已达5 000万^[21]。其中,微群是一种能够聚合有相同爱好或者相同标签的朋友们,将所有与之相应的话题全部聚拢在一起的应用形式,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微群,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趣的微群,并且为未加入微群的用户随机推荐热门微群。这种大微博里的小群体的方式更便于我们通过某个话题研究其集群状况,否则在微博中抓取海量数据就显得散乱。本文选取的个案是新浪微博中的“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作为研究对象,话题的背景如下:

2011年3月9日,南京市太平北路40多棵梧桐树被“放倒”在地,准备迁移,为地铁3号线大行宫站让道。有网友将南京太平北路此前绿树成荫的图片配以梧桐被“砍头”后等待装车的图片,在微博上转发给了著名主持人、“老南京”黄健翔。此后,黄健翔在微博上发帖呼吁拯救,并专门组建了一个拯救梧桐树的微博活动,主持人孟非、导演陆川、媒体人李承鹏等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跟进呼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回帖支持。

在舆论压力下,3月15日下午,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带领市城管局和地铁建设指挥部相关人及各大媒体进行了现场办公调研,并宣布将主城区1 000多棵要迁移的树减至600多棵。3月16日,不少南京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为可能遭砍伐的梧桐树细心地系上绿丝带,以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3月17日下午,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批示,南京的绿和树是城市的生命线和重要特色标志,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提,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3月19日,南京市民在南京图书馆门口集会抗议砍伐树木的行动。最终在3月20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地铁3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至此,南京梧桐树事件告一段落。

该事件是今年以来较为典型的一起网络集群事件,微博用户因对“砍梧桐树”这一公共话题的关注而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集群,在集群内部进行讨论,自由发表看法,协调一致和有关部门抗争,并且与线下的行动相互配合,形成了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推动了事件发展的步伐。这是平民阶层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集体维权的又一典型的案例,通过对它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看到以微博平台为基础的公民自组织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力。

论文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方法,对“南京的梧桐树”微群进行全面的描述分析,另外辅之以个人访谈,通过QQ聊天工具、微博私信等方

式对微博的发起人和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我们在研究中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与自组织理论相对应,考察“南京的梧桐树”网络集群创生条件(耗散结构理论)、动力机制(协同学)、变化过程(突变论)这三个层面是如何实现系统的自发秩序的;

第二,以个体行为理论、集群行为理论为基础,从个人动机(如利他主义、社会规范等角度)、集体理性(如集体制度、公共利益、身份认同)、环境作用(如压迫性反应、议程融合)等方面,考察中国网络集群中用户参与自组织过程的心理动因,以此思考如何促进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的讨论中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框架内,以此个案分析公民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自我组织、形成能与权力阶层相抗衡的公民社会的发展策略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 自我创生过程——网络集群自组织发生条件

自我创生,也就是系统不依靠外力,在内部实现结构和功能的自我变更,在外部实现规模的自我生长、形态的自我演化的过程。具体到网络集群中,即是考察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初始过程,包括集群形成的动力、初始成员、规模情况以及成员加入微群并发微博的动机。

“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创建于2011年3月13日,距离砍树事件4天,群主为黄健翔,群标签“树不说话,人要说话”。很显然,这个微群是一种应急性的网络聚合形式,由一个被关注的公共事件演化而来,从组织者的身份来看,其具有很强的媒体公益性质,是由现实社会的舆论领袖所主导构建的讨论平台。

3月9日砍树事件发生后,网友将图片转发给黄健翔,黄健翔于是在3月9日的微博上转发并评论道“砍南京的梧桐树,这是要疯啊”。随后“南京的梧桐树”微群成立,在成立后短短的27分钟内(23:32~23:59),就涌现了396条微博。截至2011年4月6日17:00,“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已有微博数31 257条,成员11 887人,平均日发微博条数1 250.3条。

在砍树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就有网友将被砍树木的照片放到南京本地的“西祠胡同”、“龙虎网”等网站,但在南京市内的影响不大,只有少数网友知悉此事。当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名人将

该事件推上微博后,南京梧桐树事件则演变成了全国微博用户关注的问题,在南京市民中也开始广泛传播。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到了3月14日(第二天)微博数激增到了3 117条,其中所在地为南京的微博数达到2 238条,比例为71.8%。图1分析了从3月13微群建立到3月16日23:59这个时间段的微博数量,从中能看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南京的微博用户大量加入了梧桐树事件的讨论中,这个过程没有外来指令的协调,也没有外力的支配,整个系统的规模(包含微群成员数和微群微博发帖数)却在不断扩大,系统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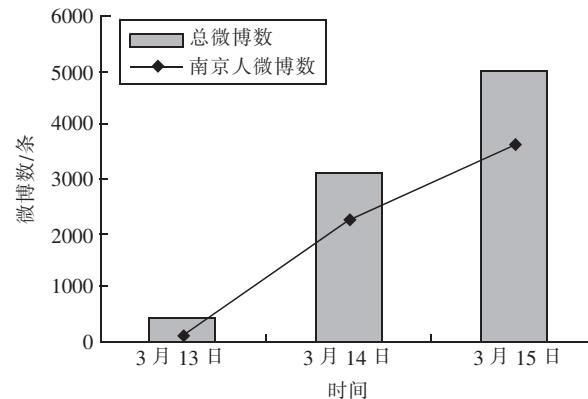


图1 微博统计数据(2011年3月13日~3月15日)

超循环理论进一步将复杂的事物和因果关系中常见的循环现象分为三个等级:反应循环→催化循环→超循环。超循环反应系统内部已经能够产生促进系统演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砍树事件刚开始,大众在知悉此事的第一时间就作出反应,认识到这是摆在市民面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共同利益的严重受损,使微博用户在无需动员的情况下就在网络上形成集群,声讨砍树的做法。南京人“wuqilu576”看到砍树的消息时非常焦虑,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被吞噬”,在南京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对南京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梧桐树被砍就“像是自己的家被盗了”,他要在微博上号召南京市民捍卫自身的利益,他在微博上写道“南京人要雄起!”黄健翔、孟非等人只是利用了自身的名人效应,充当了“放大镜”的作用,将信息进行加工、赋予其意义并传递给大众。所以我们认为,“南京的梧桐树”集群本质上是一场在微博上兴起的、由平民广泛参与的维权抗争行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本身是一种强大

的动员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用“相对剥夺感”与“压迫性反应”两种机制对其中的动员机制进行分析。

相对剥夺感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S. A. Stouffer)首先提出的概念,它是一种人们自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后的不满与积怨的结合^[22]。梧桐树给很多南京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乐小妖”特别怀念“小时候出门都不用打伞的日子,下雨了就躲在茂密的梧桐树下躲雨”,“rgxiaop”觉得倘若没有了梧桐树,“南京就不再是南京了”。另一方面,“Raver简”追溯了郑州09年修地铁时也要移走梧桐树,市民和媒体一起行动起来使得政府少移了很多树的事,以此号召南京的纸媒也行动起来。该微博获得了很高的转载率,不少用户也将南京与其他城市比较,凸显南京梧桐树的价值。从此处我们能够发现,用户出现了这样两个价值期待,一是过去的生活条件,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希望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于或至少不低于过去的生活条件,而一旦情况相反,就会感到相对剥夺;二是参照群体,人们会寻找与自身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群体比较,当自身利益实际减少时,固然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南京市民将自身的美好回忆与现实对比时,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在与其他城市比较时,发现南京梧桐树的这种“优势”将会消失,并且有城市已经存在阻止砍树的先例,于是“相对剥夺感”再次加深。另外,集群中成员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大多数微博都意图代表南京市民来抗议,在集群中呈现出同仇敌忾的状态,构建了较高的集体认同度,集群认同对于受相对剥夺而心怀不满的民众具有巨大的动员作用^[23]。

压迫性反应机制是于建嵘在研究农民维权抗争过程中提出的概念,认为在一个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的真正动机是“集团”外部的压力^[16]。本案例中,外部的压力来自于梧桐树被砍,得以栖身的环境即将受到破坏。个体的利益诉求在强大的权力部门面前显得渺小和微弱,一旦采取了某些针对政府和官员的行动都会面对各方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只有选择联合,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来完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疏解维权过程中的压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并尽可能使得群体具

有各方的代表性、权威性,将这种压力转嫁给政府部门,变被动为主动,最终获得期望的共同利益诉求。

耗散结构论认为,系统进化的真正动力来自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系统中,共同促进系统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化的催化剂或者说动力是来自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以及由“砍树”而带来的压力。二者互相作用,相对剥夺感促进了压力形成,压力的增大又会加深相对剥夺感的程度。在微博中,这两种机制在网络传播中不断“反应”,在参与者之间逐渐感染,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特有的方式“放大”出去,这又直接导致了系统规模更大幅度地增加,结构不断更新,由一个平衡过渡到下一个平衡,不断从周围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和信息,从而维持系统自组织生长的需要。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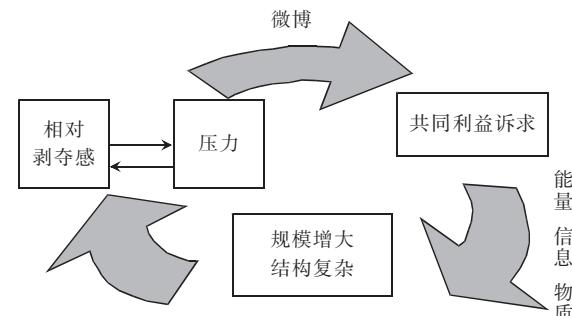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集群动力演化机制图

2. 自我生长过程——网络集群扩张的动力机制

系统的自我生长是在原有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出现新的结构、新的功能以及新的运动形式的过程,是个体在规模、复杂性方面的增长。

通过观察发现,随着讨论的深入,“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的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分散—聚合—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群里非理性意见占主导逐渐演变成理性意见占主要部分,务实的、建设性的意见逐渐代替了宣泄式的、破坏性的意见,整个过程从无序结构发展为有序结构,从简单结构发展为复杂结构。我们的任务就是揭示出网络集群中这种有序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将整个网络集群系统划分成舆论领袖、集群结构、集体认同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1) 舆论领袖

集群里的舆论领袖,是指相较于普通成员而

言,更积极更充分地在网上搜索、散发和讨论相关信息的人,不仅推动着信息的多级传播,还能凭借其原创内容对他人产生影响。以黄健翔、孟非、张宁等为代表的微博的名人即是典型的舆论领袖,他们在集群中的影响力是现实中的折射,依靠既有的粉丝数可以获得足够的关注^①;他们的意见和观点能够通过粉丝的“转发”行为被放大;他们在现实和虚拟社会的影响力足以聚合起一批新的追随者。

还有一类舆论领袖没有名人的天然影响力,但是能够依靠不断发布信息,发表理性观点而在集群中赢得较高的声望和尊重度,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某种“权力”,具有自致性,我们将他们称为草根舆论领袖。“sisidehua”、“毛毛1234860”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一般是普通的微博用户,具有非常积极的行为特征,并且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动态,在每一个变化节点上都会有发微博的行为。传统传播学认为舆论领袖在群体中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两级传播,但在网络空间中,舆论领袖概念的外延被拓展开来:一方面,信息的完全把关已经变得不可能,高度分享性和快速传递性使得任何参与者都是“把关人”,舆论领袖对于信息的控制作用减弱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在大家普遍习惯于做“闪客”的时代,能够在某种网络集群中深度扎根,积极活跃的用户本身就在无形中构建了一种影响力,在集群内部逐步扩散,成为事实上的舆论领袖。

(2) 集群结构

集群结构即网络集群成员的组织结构,或者说是成员的分工与职责。随着话题讨论的深入,原本松散的、原子式的微博个体之间渐渐形成了联系,形成了相互协调、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成员在互动中自然形成了对自身角色的定义和彼此的分工。

根据自身活跃程度、讨论内容、讨论方式等,“南京的梧桐树”集群中的参与者自发形成了决策者、搜索者、宣泄者以及旁观者这样四种不同的角色分工。决策者是集群中能够利用理性分析事件的人,他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问题的症结并给出行动方案,如“毛毛1234860”提议给现有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决策者在人群中数量很少,但是影响力很大。搜索者是集群中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与事件相关的信息并传递出去

的人,他们会转发大众媒体、民间小道消息,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如“野榔头”回顾了梧桐树与南京城的变化历程。搜索者在集群中的比重比决策者要多,保证了集群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要素的输入。宣泄者是集群中通过感叹、抱怨、责难、谩骂等方式表达对砍树事件的不满和愤怒的人,这其中分为积极的宣泄者和消极的宣泄者。前者多以感慨、抱怨、调侃为主,如“茜茜”说:“再多的树也经不起这么砍啊……”;后者则以纯粹的发泄和咒骂为主。宣泄者在集群中的人数最多,涵盖面最广,他们的讨论内容虽然信息和意义有限,但有较强的感染作用,能够引起共鸣。最后一类是旁观者,指的是集群中一般不标明自身态度,不发表相关的议论,仅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发言,如仅发一个“支持”、“关注”之类的字眼。真正的旁观者其实很难测量,他们大多选择了潜水,静观事态的变化。表1以表格的形式将这四种类型的参与者都列了出来:

表1 网络集群内四种角色的分工

角色	特征	作用	人数
决策者	理性分析	寻找解决方法	少
搜索者	搜索信息	提供相关资料	较少
宣泄者	发泄感情	实现情绪感染	最多
旁观者	耐心观察	静观事态发展	无法统计

管理学认为,分工是一个组织进行运转并实现其目的的基本条件。网络集群系统秩序的构建同样需要分工协作。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宣泄者是集群系统中最先进入的成员,其强烈的感情化表达方式能够迅速感染,让更多的参与者加入;搜索者可以为系统提供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是系统成员进行合作协同的动力来源;决策者是系统突变和涨落的主导力量,能够对系统运作进行切实有效的推动;旁观者可以看成是系统中的熵,但又具有潜质,在一定条件刺激下能够转变成前三类角色。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自我生长是这四类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每个参与者在集群中的角色分工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动态变化着的,任何一个参与者并非只有一种角色,可以多重角色合一,

^① 截至2011年4月8日,黄健翔已拥有4 629 281个粉丝,孟非拥有2 011 939个粉丝。

角色和分工之间都可以不断转化。

(3) 集体认同

集群内部需要有被成员广泛认可的集体认同,即对维权集群的认可。于建嵘曾对底层农民的维权抗争提出“以法抗争”解释框架^[24],我们也借鉴这个理论,认为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集体认同的表现在于:成员普遍赞同采用“以法维权”、“以理维权”的方式进行抗争。集群参与者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维权行动,言语、行为都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种方式:①集体行动。“毛毛 1234860”提议号召南京市民将现有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并认为“这种方式既不违法,也能表达市民关切”,活动的目的是“在遵守法律的范围内让政府了解市民关切,吸引更多市民注意,并不是要做消极的对抗”。②与政府对话。“rrkimi”呼吁大家拨打政府服务热线,让政府知道民意。与此类似有不少参与者寻求能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对话的渠道,如在政府网站中留言、写信给市长信箱等。③寻求媒体支持。“明天的梧桐”希望能让央视报道南京的梧桐树事件,还有参与者将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的联系方式发了出来,打算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遏制砍树行为。④邀请各界政要参与。不少参与者希望能借助国民党“立委”邱毅的特殊地位保护梧桐树,还有微博宣称应该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国家总理来“管一管”,利用政要的强大影响力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上是微群中最常用的四种表达维权的方式,虽然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或激烈或理性,但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中稳步推进,除了极少数言辞冲动的谩骂之外,其他的主张都能保持“以法维权”、“以理维权”。正如群主黄健翔在微博中所说“我们探讨保护梧桐树的话题,一定要理性,不要谩骂侮辱,不要扰民不能违法。假如我们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表示更强烈的关注,我们也一定要讨论设计一个合法的、文明的、不影响社会秩序的、环保低碳、无公害无污染、不制造垃圾和噪音的方式……”

这种主张已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内在集体认同,使得集群中的建议和措施都具有较强的建设性和问题意识,维权的目标是以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出,非暴力、理性地和地方政府部门对话、博弈是公民社会维权的基本方式。

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系统生长依靠系统元素之间有序进行的各种协同、合作,而协同演化机制的动力,则存在着舆论领袖、集群结构与集体认同这样三个序参量。舆论领袖保证了系统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送,并将输入进行加工、整理,成为集群讨论的物质基础;集群结构则对集群内部成员、话题进行统一的调度,支配着信息的流动、分配方式;集体认同是集群成员协调一致、不断合作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框架,是成员凝聚起来的潜在心理动因。根据伺服原理,系统的序参量能够对子系统起到支配和控制的作用。这三个序参量共同作用,使集群各子系统乃至集群整体都受其支配,社区的宏观有序性因而涌现出来,推动着系统的进化和前进,这是集群保持旺盛活力的主要动因。

3. 自我繁殖过程——网络集群与外界的互动机制

系统的自我繁殖是指个体数量上的增加,新个体与旧个体之间不仅有明显的界线和独立性,还有明显的代际传承关系。自我繁殖强调的不仅是结构和功能上的继续成长,而且母体的一部分还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新个体。

对于微群“南京的梧桐树”而言,随着微群粉丝的不断增加,话题不断增多,与现实联系也越加密切,在此情况之下,线上针对梧桐树话题的讨论和线下的行动产生了多层次的互动。我们将以自组织中的涨落和突变理论为基础,对整个梧桐树事件的事情演变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涨落是系统状态量对其平均值的偏离,是自组织的触发器。而系统突破临界点通过涨落建立新的有序结构的过程就是突变^[25]。系统通过涨落达到有序,从一种有序态达到另一种有序态,都面临着突变分叉,即面临着多种可能的结果。分叉点是从旧结构到新结构发生相变的突变点。

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涨落点的出现让系统出现了分叉,而使得部分子系统演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中进一步促进了事件的阶段性的的发展,一步一步让系统再次朝向另一个有序状态发展。

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创建不到 10 分钟,微群成员“毛毛 1234860”就发出了一条倡议:“我想到一个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方法,既不违法,

又能表达市民关切,就是号召市民们在现有的梧桐树上系上绿丝带。”发出倡议之后其本人的微博状态得到了 52 个人的转发,并且以@更多人的方式使人们了解到了该活动。此次系统内部的倡导使得事件很快形成了一个小涨落。而此次涨落在呼吁政府停止砍树的过程中也让事件达到了一个小临界点,成为了一个形成突变的触发机制。3月 14 日上午,大家就发现中山东路沿线的梧桐树上被人们系上了绿丝带以抵制砍伐的行动。该行动其实是作为系统内部的涨落引起了系统稍微偏离了原来的平衡状态,而导致了突变,使得现实生活中很快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行动。在行动产生之后,许多网友表示赞同支持,继续保持绿丝带的行动,更深一步地继续“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活动,让系统内部又慢慢回复到了一个平衡态。

3月 15 日,中国国民党“立委”邱毅在微博中表示“若南京市府再不停止砍树,他会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护树”。次日,邱毅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提案,希望透过海协会和海基会,协调南京市梧桐砍伐事件。而国台办在 17 日的新闻发布会中称相信南京市府会妥善处理此事。邱毅的相关行动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涨落力,使得集群行动又面临了一个大的突变。此次突变分叉又充满了各种可能,市政府或者接受各方呼吁停止砍树,或者仍然坚持砍树建设地铁。邱毅微博发出不到一个小时内,在“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中就有人转发此消息,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转发和支持,甚至有人直呼“恳请国民党高层出面,停止杀戮”,但是也有人表示不想把政治牵扯进来,只需要自己的梧桐树。邱毅微博状态的更改成为微群系统内部的一个外涨落因素,使得微群成员在此次事件上有了更激烈的讨论和分析,也让系统再次面临了一个突变分叉点。网民力保梧桐树的决心使得他们在网络上的行动更加积极有序,最终也终于使得事件出现了一个转机。3月 15 日下午,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带领市城管局和地铁建设指挥部相关人员及各大媒体进行了现场办公调研,并宣布将主城区 1 000 多棵要迁移的树减至 600 多棵。南京市城管局新闻发言人徐少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建设地铁,移树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管理部门所能做的就是与地铁建设部门一同协商,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尽量少移树木。副市长对该决定的宣布让护

树支持者们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坚定了不能妥协的决心。整个集群系统内部再次发生了信息的交换、调节,达到了一个新的状态。

系统更明显的繁殖和壮大体现在微群内部对 3 月 19 日集会行动的号召与支持。此次行动成为了系统的一个典型突变分叉点,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这也印证了托姆的突变分叉理论,系统进化具有的非必然性或偶然性。针对此次行动南京市府面临两个分叉:要么南京市府最终向市民的呼吁妥协,不再进行砍树的行动;要么市民的行动被镇压,网络行为被“和谐”,系统最终受到破坏。而在此次行动中由于网民们齐心协力的决心和各种有序的安排,最终在 3 月 20 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地铁 3 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而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在整个 19 号下午的集会行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涨落力对于微群系统内部的影响,系统也不断进行信息的输入、交换和输出,进入了耗散结构的分支。现场成员不断报告现场的相关场景和信息。最后在警察的疏散中人们陆续离去,但是抗议人群与事先来到现场的警察并未发生大的冲突,整个突变下的行动显得理性而有组织。而 3 月 20 日市政府的决定也让突变朝着另外一个平衡的状态发展。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很多大大小小突变,而影响突变发生的因素则是随机的,没有决定性的涨落。

系统的自我繁殖是一个不断产生子系统的过程,而随机的涨落驱动着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获得物质、能量、信息时的非平衡过程,使得一些子系统“涨”、“起”,在瞬间具有了更大的不稳定性,另一些子系统“落”、“伏”,在瞬间具有了更大的稳定性,于是系统之中出现了差异和不平衡,在临界区域附近则会通过突变的方式再朝着另一个平衡状态发展^{[7]56}。所以在整个网络集群的自我繁殖过程中,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涨落引发可能的突变,使得系统朝向一个更为有序平衡状态发展。

4. 自我衰退过程——网络集群的行动弱化机制

系统的自我衰退是当系统所获得的物质、能量、信息低于维持系统现有结构形式运转的要求时,系统就可能走向解体,退回到较低的层次状态。对于自组织系统,当外部环境和内部随机运

动的干扰在一定限度之内时,系统能够达到适应性自稳定,而当干扰超过相应阈值时,系统就要面临瓦解的结局^[2]。

在自组织理论中,进化特指的是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演化形式,而退化是个相反的过程,是从高级有序向低级有序或从有序向无序的变化,所以一般而言自组织的进化理论并不包括退化,但是对于一个系统而言,其自我衰退的过程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系统不能够更进一步地演化发展而只能走向不断衰退的过程。

在“南京梧桐树”微群中,3月19日之后当市政府决定先全面停止砍树并召开民众听证会以后,整个微群暂时缺乏一个强大的涨落力来使系统得以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此之后微群成员们还是经常在关注之前的集会行动或者当前的梧桐树状况,有时能形成系统内部的一个微弱的信息交换,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整个系统朝着更为高级的状态发展。3月21日一个名为“企鹅臭PP王珂”的微群成员就说:

“明天大家要开始讨论如何合理解决3号地铁跟路面梧桐树的问题了,今天一整天大家都跑题了!别忘了我们最终目的是保护剩下的梧桐树!时间紧迫啊!”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面临着阶段性的胜利之后就已经较之前减弱了参与主要话题的讨论,而微群之后甚至只成为了内部成员发布信息以及感想的平台,整个系统呈现了衰退的趋势。

对于“南京的梧桐树”这个微群而言,对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结构的变化。由于微群成员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没有新的突变发生,不会出现耗散结构,也不会出现物质、信息、能量的输入,由此能够维持系统正常运转的结构功能已经逐渐紊乱,这时系统内部为了能够让自己达到平衡,必须选择自退化的方式降低系统的功能。因此在该微群中虽然系统内部已经没有大量成员针对一个话题发表观点,但是在整个系统维持中微群内部仍会以或大或小的交流方式对微群主题“保护南京梧桐”进行呈现。如在市政府答应停止砍树重新商议措施之后,集群

内部会通过以随时关注事态进展的方式在微群内部进行交流。3月23日,微群成员“柳浪风荷”说:

“今日《扬子晚报》:‘绿评’将从地铁3号线开始试行,这次南京市住建委已经初步邀请了25名专家和市民代表作为咨询人员的候选。”

在之后的微博中我们可以看见关于这些最新事件进展或者与梧桐树有关的微博内容仍然在系统内部出现,但是因为系统的功能已经降低和调整,所以在系统内部除了有关梧桐树的讨论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话题的讨论或者个人感想的发布。

对于系统内部会出现衰退的原因从自组织理论来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维持系统运转的物质、信息和能量,而这些信息能量其实更具体来说就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非持久性。本次“南京的梧桐树”事件从3月9日砍树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开始到最后市委书记宣布停止砍树,一共也就11天的时间,就让事情得到了很快解决。这种网络政治参与的快速性也导致了网络政治的持久性时间缩短,在事件解决以后网络集群内部的主要任务就得以完成,从而对主话题的关注就会逐渐散去。

系统的自我衰退过程其实也是对其内部平衡状态的一个调整,虽然已经不能如前面三个阶段呈现活跃的局面,但这是系统作为适应内外环境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最后系统的自我衰退会让网络集群逐渐弱化,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网络集群已经以一个有序有组织的方式组建了整个系统,其逐渐退化只不过是一个网络集群行动最终的走向趋势。

四、结语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社会诉求也在不断提高,群众的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而倘若继续固守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无疑承担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一方面,公民开放式地广泛参与,能够使得底层的声音得到放大,形成强大的舆论

场,间接影响着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纷纷开通微博,尝试通过微博与民众互动的新形式,平等地与公众沟通和对话,营造地方党政良好形象和提升公信力。从“南京梧桐树”事件的微博维权中,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民众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热情与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自组织过程的四个阶段是系统功能和结构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同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不断交换的过程。以“南京的梧桐树”为代表的理性参与维权的方式是具有积极效果的,这种自觉形成的稳定,才是社会管理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即民众的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南京的梧桐树”集群虽然积累了相当的参与度,但真正活跃的深度参与者并不多,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快闪”一族,没有耐心参与到事件的发展和解决中来,只是碎片化地发表宣泄式的言论,在集群中的作用有限。另外,参与者虽然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赋权,但是还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现实中有较高声望的参与者在集群中的影响力会依旧存在,而且会随着参与程度的增大而加强,但普通用户的言论很容易被湮没,除非能够锲而不舍地专注于集群中的讨论,并真正提出有见地的意见,才有可能积攒起一定的关注度,而往往这属于少数。最后一点,自组织秩序的构建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①对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着直接关系,灌水、宣泄、偏题等讨论方式都是网络集群中的无组织力量,对集群的发展和进化没有太多益处。无组织力量的强弱与系统秩序之间成反比,无组织力量越强,系统秩序越弱,反之亦然。如何减少无组织力量的繁衍也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 [2] 武艳君,刘丽晶.论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现象[J].系统科学学报,2007(1).
- [3] 施启良.系统定义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1).
- [4] 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第三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81-83.
- [5] 张真继,张润彤.网络社会生态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16-17.
- [6] HOFKIRCHNER W. A critical social systems view of the Inter-

net[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07,37: 471.

- [7] 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8] 金兼斌.发挥网络公共空间宝贵的“自组织”潜力[J].华人世界,2011(1).
- [9] 彭兰.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 [10] 孙佳音,高献忠.虚拟社区的自组织特征及其规则生成问题[J].学术交流,2008(7).
- [11] 杜骏飞,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 [12] 沈晖.网络集群行为与社会工作介入策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 [13] LEA M, SPEARS 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decision-mak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1991, 34, 283-301.
- [14] 魏娟,杜骏飞.网络集群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J].青年记者,2009(10).
- [1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6] 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J].南京:学海,2006(2).
- [17] 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辨[J].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94(5).
- [18] 孙凤,郑欣.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及其演变[J].南京: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 [19] SMITH E R, CONREY F R. Agent-based model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psychology[J].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1(11): 87-104.
- [20] 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2011(1).
- [21] 沈杨,杜骏飞.新媒体开启新时代[J].北京:新闻战线,2011(2).
- [22] 窦宝国.“相对剥夺”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盗窃问题研究[J].学理论,2009(8).
- [23]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3).
- [24] 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基层政治[J].福州:东南学术,2008(3).
- [25] 姜胜.虚拟社区自组织演进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下转第34页)

^① 所谓“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